

战前日本右翼势力的谱系构成 及其历史嬗变

孙立祥

(山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 济南 250358)

摘要: 战前日本右翼势力经历了从“传统右翼”谱系向“革新右翼”谱系的嬗变。“传统右翼”谱系的骨干成员来自幕末保守派士族,其龙头团体是玄洋社和黑龙会,主体思想是天皇中心主义和大亚细亚主义,历史危害主要体现在协助政府打赢了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革新右翼”谱系与“传统右翼”谱系既有区别又一脉相承。其核心团体是犹存社和樱会,主体思想是国家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历史危害集中体现在给亚太国家带来了创巨痛深的民族灾难。战前日本右翼势力研究有5个问题须给予特别关注和重视:对其祸国殃邻的历史危害性要有深刻的认识,对其思想理论的毒害性不宜低估,对其逞凶肆虐的社会土壤不应回避,对其成员的所谓“献身精神”不可掉以轻心,对其暗杀传统需保持高度警惕。

关键词: 日本右翼势力 “传统右翼”; “革新右翼”; 谱系构成; 中日关系

中图分类号: K31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19) 11-0117-10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在“战前60年”将本国拖进了灾难深渊,给亚太国家带来了空前劫难,而且在“战后70年”一直恶化着日本社会的政治生态和与亚洲邻国的外交关系,时至今日再度对日本内外政策走向和中日关系走势构成了潜在威胁。对此,不仅日本国内外有识之士一再向世人发出警告,而且中国等亚洲邻国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① 因为就实质而言,日本在战前为祸亚太国家的过程,主要就是日本“传统右翼”谱系(1881—1919)与“革新右翼”谱系(1919—1945)逞凶肆虐的过程;战后中日邦交迟迟不能恢复以及复交后两国关系屡生龃龉,主要就是日本“战后派右翼”谱系(1945—1982)与“新右翼”谱系(1982—2015)百般阻挠和破坏所致。在中日关系步入新时代但仍然不时受到干扰的新形势下,厘清日本右翼势力的谱系构成并梳理其百年演变轨迹,不仅具有弥补、拓展和深化该课题研究的学术价值,而且对确保新时代中日关系的发展行稳致远具有重大现实意义。限于篇幅,本文就“战前60年”日本右翼势力的谱系构成、历史危害以及务须重视的若干问题进行尝试性探讨。

在此,需首先界定两个关联概念。

一是,何为“右翼”?“右翼”一词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公会(1792—1795)。当时,国民公会中的765名议员形成三派政治势力:以罗兰为首的165人为保守派(吉伦特派),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100人为激进派(雅各宾派),其余500人为摇摆不定的中间派。从议长席位望去,保守的吉伦特派集中坐在右侧的席位上,激进的雅各宾派集中坐在左侧的席位上,立场摇摆的中间派恰好集中在中间的席位上。自此,凡政治思想行动倾向保守的集团、政党、阶级或集团、政党、阶级中政治思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8JZD028)。

作者简介:孙立祥,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日本史、中日关系史。

① 具体参见孙立祥《中共领导人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动向的关注与警惕》,《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enki.net

想行动趋于保守的政治势力,就被称为“右翼”。“右翼”与“左翼”称谓源于当年法国资产阶级内部保守派与激进派的尖锐对立,因此,欧美国家的“右翼”概念无论在词源上还是在语义上,都打上了鲜明的政治和阶级烙印。

二是,何为“日本右翼势力”?本文所谓“日本右翼势力”,除具有欧美右翼势力反共、反民主、反自由、反平等一系列基本特征外,还独具日本一国之特质:深信天皇是“神”、日本是“神国”、大和民族是“优秀民族”,对天皇和国家绝对忠诚;轻理论、重行动、崇尚暴力、迷信武运,热衷暗杀和政变,对现行国家政体实施颠覆;信奉封建集权主义、天皇中心主义、超国家主义、侵略扩张主义,对弱邻攻战杀伐,以实现“八紘一宇”之妄想。不难看出,尽管“日本右翼势力”概念在词源上援用了法国大革命时期诞生的“右翼”一词,但在语义上与赋予了政治性和阶级性的欧美国家的“右翼势力”概念迥然不同,即日本右翼势力不仅具有超阶级性、超政治性特质,而且有着浓厚的封建性^①、狭隘的民族性、疯狂的侵略性和罕见的野蛮性等特点。

一、“传统右翼”谱系

1881年玄洋社的成立,标志着“传统右翼”谱系肇生。该谱系不仅启动了日本右翼势力祸国殃邻的历史进程,而且在思想结构、组织构成、活动方式等方面为日本百年右翼运动奠定了基础。因此,对“传统右翼”谱系进行深度解剖,无疑有助于认清日本右翼势力的来龙去脉及其在日本百年右翼运动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1. “传统右翼”谱系的基干成员来自幕末保守派士族

早在19世纪中叶“黑船”来航、被迫“开国”前后,日本国内就形成了主张“尊王攘夷”的以士族(主要是中下级武士)为核心的国粹主义势力——尊攘派。随着明治初年维新变革的深入,为新政权的诞生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保守派士族很快丧失了既得利益。这些失意士族基于“国内损失国外补”这一传统思维定式,向明治政府提出了“征韩”主张。当这一主张被奉行“内治优先”国策的新政府断然拒绝后,他们便接二连三地制造了“佐贺之乱”(1874)、“神风连之乱”(1876)、“秋月之乱”(1876)、“荻之乱”(1876)、“思案桥之乱”(1876)等一系列叛乱事件,并最终酿成大规模的几近撼动新政权根基的“西南战争”(1877)。新政府一一平定叛乱,最终取得了西南战争的胜利,残余士族被进一步分化。除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等人后来参加甚至领导了自由民权运动外(这些人最终也都从“自由民权论者”转向了“国权扩张论者”),多数士族更趋保守和反动,并成为日本“传统右翼”团体的卵翼者和骨干成员。日本右翼势力尤其日本“传统右翼”谱系的超政治性和超阶级性,当与其基干成员主要来自德川幕府末期的保守派士族不无关联。

2. “传统右翼”谱系的龙头团体是玄洋社和黑龙会

早在明治初年,九州北部沿海城市福岡的青年“志士”,就陆续建立了兴志塾、空华塾、娇志社、强忍社、坚志社、开垦社、向阳社等多个早期右翼组织。^②不过,首个严格意义上的“传统右翼”团体,是由头山满、平冈浩太郎等人于1881年2月在福岡建立的从向阳社演变而来的玄洋社。因“向阳二字有对着太阳而影射天皇的大不敬之意”^③,遂更名为玄洋社(虽然由平冈出任第一任社长,但其精神领袖是被尊奉为“右翼的帝王”头山满)。玄洋社中的“玄”字,系指九州岛北端面向大海的一片“玄海滩”;“洋”字,系指将九州岛与朝鲜半岛隔开的朝鲜海峡,泛指将日本列岛与大

^① 吴限《日本明治时期的右翼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0页。

^② 明治初年,破落的中下级武士锁定的第一个侵略目标就是朝鲜,而地理上日本距朝鲜最近之地就是福岡。因此,当时福岡一地集中了数万名保守派士族。这样,福岡成为日本右翼团体肇生和泛滥之地也就不令人费解了。

^③ 玄洋社社史編纂会編『玄洋社社史』東京:玄洋社社史編纂会、1917、225頁。

陆分开的广阔海洋。当年，头山满等右翼首领将向阳社更名为玄洋社，意在“明志”，即自认为肩负着“越过朝鲜海峡君临大陆”^①、实现明治天皇“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②之使命。

玄洋社的成立不但启动了日本右翼势力“祸国殃邻”的历史进程，而且为日本百年右翼运动规定了方向、奠定了基础：（1）为日本百年右翼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即天皇中心主义、狂热国粹主义、极端国家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大亚细亚主义等。玄洋社“宪则”中“敬戴皇室”（第一条）、“热爱日本”（第二条）等条目^③，便足以表明这一政治思想理念。（2）为日本早期右翼运动培养了核心干部与骨干成员。日本“传统右翼”谱系中的骨干分子，大多出自“玄洋社三杰”头山满、平冈浩太郎、箱田六辅的门下。而由所谓“明治、大正、昭和三代最伟大的导师”^④头山满亲自调教出来的右翼分子，则多系“传统右翼”谱系中的中坚人物。（3）成为日本“传统右翼”团体的“孵化器”。玄洋社直接或间接“孵化”出黑龙会、浪人会、活动党、天佑侠、修养团、大东塾、大日本国粹会、大和民劳会等大大小小“传统右翼”谱系之团体，其中纲领最完整、组织最严密、目标最明确、影响和作用最大者要数黑龙会。1901年2月，在俄国势力伸向“满洲”，令日本人产生“危机感”的背景下，^⑤玄洋社核心成员之一内田良平于东京创立黑龙会。黑龙会以头山满为顾问，以葛生能久等“大陆浪人”为骨干。从“黑龙”二字不难看出，“其目的就是要将侵略势力推进到黑龙江畔”^⑥。后来，在策划“满蒙独立运动”、发动日俄战争和“九一八”事变过程中，黑龙会的确发挥了别动队和马前卒的作用。玄洋社、黑龙会等“传统右翼”团体在日本百年右翼运动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3. “传统右翼”谱系的主体思想是天皇中心主义和大亚细亚主义

“传统右翼”谱系的思想主张主要反映在右翼团体的纲领中，其中涉及内政、外交、军事、教育、社会等诸多方面的黑龙会的纲领最具代表性。其主要内容包括：“（1）吾等致力于恢复肇国之宏旨，阐明东方文化之大道——以期皇国成为亚细亚民族振兴的领导者。（2）吾等致力于一洗目前偏重法治主义而束缚人民之自由、缺乏洞察时局之能力而影响公私之效率、湮没宪政体制本来之宗旨等各种弊端，以期发扬天皇主义之真谛。（3）吾等致力于改革现行制度，振兴外交，以图向海外发展；志在革新内政——以图巩固皇国之根基。（4）吾等信奉军人敕谕，弘扬尚武精神，实现全民皆兵，以期实现国防机构之充实。（5）吾等致力于从根本上改革效仿欧美之现代教育，奠定扎根于国体渊源的国民教育之基础，以提升大和民族的功德良知。”^⑦五条纲领中的“恢复肇国之宏旨”“发扬天皇主义之真谛”“以期皇国成为亚细亚民族振兴的领导者”“以图向海外发展”“实现全民皆兵”等关键词句足以表明，黑龙会不仅是一个有着完整纲领和明确目标的“传统右翼”组织，而且其对内建立天皇独裁政权、对外实行侵略扩张的政治主张和思想理念，成为日本百年右翼运动的指导思想。换言之，尽管“传统右翼”谱系中尚未出现有影响的右翼思想理论家，其思想主张大多散见于右翼团体各自的纲领中而未成系统，其上述对内对外主张却成为日本百年右翼运动的思想源流，即“大亚细亚主义、天皇中心主义、国粹主义等现代右翼团体的思想原型已初露端倪”^⑧。

4. “传统右翼”谱系协助明治政府打赢了两场改变三国命运的战争

“传统右翼”势力的政治活动同时指向对内、对外两个方面，但侧重点对外。“传统右翼”对内

① 堀幸雄『右翼辞典』東京：三嶺書房、1991、179頁。

② 吉野作造編『明治文化全集』第2卷、東京：日本評論社、1928、34頁。

③ 玄洋社社史編纂會編『玄洋社社史』東京：玄洋社社史編纂會、1917、226頁。

④ 大川周明『頭山滿と近代日本』横浜：春風社、2007、19頁。

⑤ 堀幸雄『右翼辞典』東京：三嶺書房、1991、233頁。

⑥ 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2册，尚永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15页。

⑦ 木下半治『日本右翼の研究』東京：現代評論社、1977、57頁。

⑧ 高木正幸『右翼・活動と団体』東京：土曜美術社、1989、41頁。

制造了一系列旨在建立天皇独裁专制统治的恐怖事件。1878年,右翼分子岛田一良刺死了“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罪名是后者“独断专行”妨碍了“天皇亲政”。^①1888年,右翼分子来岛恒喜投弹炸废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一足,罪名是后者在“修约”谈判中向西方列强妥协。1889年,右翼分子西野文太郎刺杀文部大臣森有礼,罪名是在参拜伊势神宫时“失敬”等。“传统右翼”对外充当明治政府侵略扩张的帮凶。1882年“壬午兵变”爆发,玄洋社首领头山满不但叫嚣“与其对朝鲜下手,莫如先将中国吃掉”^②,而且试图组建一支“征韩义勇军”进攻朝鲜。1886年,右翼分子不但制造了与清军官兵冲突的“长崎事件”,而且公然叫嚣“必须实行军国主义”。^③1894年朝鲜东学党事起,头山满、内田良平等立即组织武装团体天佑侠赴朝搜集情报和开展军事活动,加速了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战争爆发后,玄洋社社员藤岛武彦、楠内友次郎、福源林平、藤崎秀、山崎羔一郎、钟崎三郎、石川伍一、向野坚一、宗方小太郎等鱼贯赴华刺探军事情报。除宗方小太郎、向野坚一侥幸逃回日本外,上述人等全部落网并被处决。尽管如此,玄洋社社员在甲午战争期间“前赴后继”的情报搜集活动,不仅使伊藤内阁在外交运作上游刃有余,也确保了日军在海陆战场上的连战连捷。日军能够在丰岛海战、黄海海战、威海卫战役、牙山战役中重创清朝海陆军,靠的正是石川伍一、宗方小太郎、关文炳、山崎羔一郎等隶属于玄洋社的日本间谍提供的绝密情报。

如果说玄洋社主要协助日本政府打败了“大清帝国”,那么黑龙会则主要配合日本政府战胜了沙俄。基于对“三国干涉还辽”这一“千古未有之奇耻大辱”的激愤^④,玄洋社核心成员内田良平在甲午战争一结束就开始准备对俄战争。他亲自踏查中、俄、朝三国交界地——延边地区的地形地貌,横穿西伯利亚,并远赴俄国首都圣彼得堡搜集情报,而且发表了《俄罗斯国内之重大缺陷》一文,得出俄国“不足为惧”的结论,发出“日俄必战”第一声。^⑤1901年,内田良平建立黑龙会,自此其协助政府发动日俄战争之活动进入了有组织、有纲领的实施阶段。黑龙会在《趣意书》中提出:“当务之急是对俄一战,将其从东亚击退,然后建立以满洲、蒙古和西伯利亚为一体的大陆经营之基础。”^⑥果能如此,“则百年大计可立,万里雄飞之梦可成”^⑦。黑龙会不仅通过机关刊物《黑龙》连篇累牍地发表“对俄强硬论”,进谏当局“对俄一战”,而且根据其会员在中俄两国搜集的调查资料,绘制出版了详细注明村庄、道路、河流、设施、物产等的《最新满洲图》和《俄国东方经营部面全图》,为发动日俄战争进行了充分准备。战争爆发后,黑龙会及其下线团体大日本一新会成员,还作为“死士”参加了由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武官青木宣纯组织的“特别任务班”,在黑龙省各地炸桥梁、毁铁路、切断俄军补给线、捣毁俄军军火库、收买当地土匪袭击俄军后方等,有力地策应了日军行动。可见,中俄两国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不但败在了军事上,也输在了情报上。而日方对中俄两国的情报优势,正是由玄洋社、黑龙会等“传统右翼”团体及其成员所成就的。

总之,明治时期的“传统右翼”谱系无论在思想上、组织上还是在活动方式和手法上,都为日本百年右翼运动提供了脚本。

二、“革新右翼”谱系

随着犹存社于1919年宣告成立,“革新右翼”谱系逐渐取代“传统右翼”谱系,成为战前日本

① 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3册,周启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60页。

② 黑竜会編『東亜先覚志士記伝』上、東京:原書房、1966、310頁。

③ 玄洋社社史編纂会編『玄洋社社史』東京:玄洋社社史編纂会、1917、408頁。

④ 満川亀太郎『三国干渉以後』東京:伝統と現代社、1977、17頁。

⑤ 王希亮《日本右翼势力与东北亚国际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0页。

⑥ 黒竜倶楽部編『国土内田良平伝』東京:原書房、1967、245頁。

⑦ 内田良平文書研究会『黒竜会関係資料集』東京:柏書房、1992、3頁。

右翼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如果说“传统右翼”谱系为日本百年右翼运动奠定了基础、规定了方向，那么“革新右翼”谱系则写下日本右翼势力凶凶肆虐的最黑暗的一页。因此，对“革新右翼”谱系进行彻底解剖，不仅有助于把握其与“传统右翼”谱系的内在联系，而且对洞悉其在日本法西斯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和评估其历史后果均有裨益。

1. “革新右翼”谱系与“传统右翼”谱系既有区别又一脉相承

新思想的传播是新团体产生的前提。随着北一辉、大川周明等人对法西斯思想的传布，一批与“传统右翼”组织不同的法西斯团体应运而生。因这类新团体均以“革新”“革命”面目出现，故被称为“革新右翼”。也就是说，在日本右翼势力百年演变的历史延长线上，从1919年到1945年间，“传统右翼”思想和团体让位于“革新右翼”理论和组织，即“革新右翼”谱系取代“传统右翼”谱系成为日本右翼势力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其一，“传统右翼”谱系的思想主张散见于右翼团体的纲领中，零散而未成系统，而“革新右翼”谱系的思想主张主要集中在右翼思想理论家的著作中，完整且系统。其二，“传统右翼”谱系的人员构成和政治活动基本局限于少数保守派士族和“大陆浪人”的范围内，“革新右翼”谱系则注重组织的开放性和政治活动的群众性。其三，“传统右翼”谱系将政治活动重心放在配合政府对外战争方面，而“革新右翼”谱系的政治活动同时指向对内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与对外协助政府进行侵略战争两个方向。日本右翼势力出现这一“谱系”代际变化并不奇怪，这既与法西斯在欧亚大陆安家落户的国际大背景密不可分，也是日本国内几乎同时出现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大正德谟克拉西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的局面使然。这是因为“日本右翼形成和发展的特点之一，即右翼往往是作为左翼的对立面而存在和发展的。在很多情况下是先有左翼，后有右翼，先有左翼的进步思想，后有反对左翼思想的右翼主张”^①。当然，无论思想、组织还是活动方式方面，“革新右翼”谱系与“传统右翼”谱系都具有明显的承继性即一脉相承性。

2. “革新右翼”谱系的核心团体是犹存社和樱会

据日本警察厅统计，1927年日本右翼团体有百余个，到1932年逾千个^②，至1939年已有1733个，达到182192人，且多隶属于法西斯“革新右翼”谱系，达到了战前右翼势力的顶峰时期。^③其中，犹存社和樱会分别发挥了民间“革新右翼”团体与军队“革新右翼”团体“孵化器”的作用。

1919年8月1日，大川周明、满川龟太郎在东京建立了首个法西斯团体——犹存社。“犹存”二字，一说源于唐朝魏徵《述怀》诗中的“纵横计未就，慷慨志犹存”（“荒原朴水说”），另一说取自晋代诗人陶渊明《归去来辞》诗中的“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木下半治说”）。^④无论源于何人何处，均系表达誓为国家“中流砥柱”之意。该团体成立不久，即邀请北一辉加盟并出任头目。犹存社虽然没有直接付诸“国家改造”行动，但它通过机关刊物《雄叫》所进行的法西斯思想宣传，毒化了一代青年学生和少壮军官。如同玄洋社卵翼出黑龙会等多个“传统右翼”团体一样，犹存社直接或间接“孵化”出了双叶会、光之会、魂之会、潮之会、大化会、白狼会、大行社、爱国社、赤化防止团、大日本正义团、大日本生产党、国粹大众党、明伦会、血盟团、日本国家社会党、日本革新党、大日本青年党、皇诚会、东方会、大日本一新会等一批“新种”法西斯“革新右翼”团体。

随着北一辉、大川周明等人向军队迅速渗透法西斯思想，类似荒木贞夫、桥本欣五郎的军人法西斯分子大量涌现，并在军队中建立了多个法西斯团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完全由现役军人组成的樱会。1930年9月下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少壮军官在东京秘密成立樱会。樱会成立不到1年就

① 林晓光《日本右翼思潮与右翼团体史考》，《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

② 藤原彰『日本民衆の歴史・9・戦争と民衆』東京：三省堂、1975、285頁。

③ 荒原朴水『増補大右翼史』東京：大日本一誠会出版局、1974、519頁。

④ 堀幸雄『右翼辞典』東京：三嶺書房、1991、592頁。

发展到150余人,其中包括后来臭名昭著的战争狂人——牟田口廉也中佐、武藤章少佐、影佐祯昭中佐等。樱会“以国家改造为最终目的”,以“确立以天皇为中心的充满活力和透明的国政”为成立宗旨,以“解决满蒙问题,必须以国家改造为先决条件”为纲领,以“限于陆军中官阶在中佐以下、关心国家改造并毫无私心者”为入会条件。^①1931年1月,樱会制订出“国家改造”具体方案。在该方案指导下,其对外配合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一举得手,但随后对内策划的三月事件、十月事件等均未果而终。

3. “革新右翼”谱系的主体思想是国家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在“革新右翼”谱系的思想库中,除了从“传统右翼”谱系继承下来的天皇中心主义、大亚细亚主义外,以“国家改造”为核心内容的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成为主体思想,而这些思想主要集中在北一辉、大川周明等法西斯右翼思想家们的著作中。

首先,北一辉作为日本“革新右翼”谱系的理论旗手,其法西斯思想最具迷惑性、煽动性和影响力。1919年,北一辉推出了被奉为“日本法西斯圣经”的《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后更名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一书,全面阐述了自己的法西斯理论:一是“国家改造论”,号召由具有“法西斯献身精神”的军人用武装政变手段改造国家,建立天皇制军事独裁政权。^②二是“天皇中心论”,盛赞明治天皇是“国民之总代表”和“国家的根柱”。^③三是“亚细亚联盟论”,宣称“随着国家改造的完成,亚细亚联盟乃可义旗翻扬而真正到来,日本乃可执世界之牛耳”。^④四是“侵略有理论”,即把英国比作全世界的“大富豪”,把俄国比作北半球的“大地主”,把日本比作世界上的“无产者”,声称日本应“堂堂正正地向彼等开战以夺取其独占之权利”。^⑤这明显是在为侵略扩张国策提供“理论依据”。北一辉不曾参与“二二六”政变,却因“思想主犯”罪名处以死刑,足见其法西斯思想所具有的影响力。

其次,大川周明作为与北一辉齐名的法西斯运动理论家和活动家,在日本法西斯化进程中具有特殊地位。他通过《复兴亚细亚诸问题》4作,阐述其法西斯理论和主张。一是“天皇中心论”。他认为“万世一系”的天皇是“日本之国粹”和“冠绝五洲的日本精神”,要依靠天皇和军人来完成“国家改造”和进行侵略扩张。^⑥二是“东西对抗论”。他认为东西方关系史就是一部亚细亚与欧罗巴反复战争的历史,肯定并盛赞战争“使新文化得以产生”^⑦,并叮嘱日本人随时做好战争准备。三是“大东亚秩序建设论”。其所谓日本援助中国改良和革命“除了切望支那复兴外别无他意”之说法、蒋介石与英美联合抗日是“蹂躏兴亚大义”之说词等,^⑧既是在为当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寻找“理论依据”,也出人意料地成为今天日本右翼势力进行战争翻案的“历史根据”,影响十分深远。

值得注意的是,北一辉与大川周明在鼓动“国家改造”、鼓吹“战争万能”等方面并无区别,所不同的是:(1)大川周明的法西斯思想是以“天皇中心主义”为基础,北一辉的法西斯理论则建立在“国家中心主义”基础上,因此不追求为天皇献身,只愿为国家效命。(2)在对内“国家改造”和对外侵略扩张的先后顺序上,大川周明主张二者同步进行,而北一辉力主先进行“国家改造”,后实施对外侵略。(3)在敌国的确认上,大川周明将美国视为主要敌国,北一辉则把英、俄两国作为主要敌人。(4)在参与政治活动方面,大川周明是理论建构与政治活动并重,而北一辉主要是用思

① 堀幸雄『右翼辞典』東京:三嶺書房、1991、256-257頁。

② 江口圭一『日本ファシズムの形成』東京:日本評論社、1978、17頁。

③ 伊文成、汤重南、贾玉芹主编《日本历史人物传》(近现代篇),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24-625页。

④ 吕万和《简明日本近代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65页。

⑤ 『現代史資料・23・国家主義運動』東京:みすず書房、1974、67頁。

⑥ 伊文成、汤重南、贾玉芹主编《日本历史人物传》(近现代篇),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29页。

⑦ 『大川周明全集』第2卷、東京:岩崎書房、1962、839-841頁。

⑧ 『大川周明全集』第2卷、東京:岩崎書房、1962、864-866頁。

想理论来指导和推进日本右翼法西斯运动，绝少直接参与政变和间谍活动。尽管如此，两人在引领日本走向侵略战争这一大目标上是完全一致的，在推进日本法西斯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分伯仲。从“侵略战争”源于“侵略政策”，“侵略政策”又源于“侵略思想”这个逻辑意义上说，北一辉、大川周明、权藤成卿、橘孝三郎等以法西斯理论为祸人类的思想家们，才是当年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元凶。

4. “革新右翼”谱系给包括日本在内的亚太国家带来了创巨痛深的民族灾难

这一时期，尽管“革新右翼”谱系与“传统右翼”谱系并存且呈现出殊途同归趋势，但在日本右翼政治舞台上扮演主角的是“革新右翼”谱系。尤其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革新右翼”势力重点煽动少壮军官断然实行所谓“昭和维新”，试图实现北一辉、大川周明等人的“国家改造”构想和侵略扩张目标。

(1) 在“国家改造”方面。“革新右翼”势力通过制造刺杀安田财阀首脑事件（1921）、刺杀原敬首相事件（1921）、刺杀滨口首相事件（1930）、刺杀藏相井上准之助和三井财阀总裁团琢磨的血盟团事件（1932）、刺杀犬养毅首相的“五一五”事件（1932）、刺杀斋藤实内大臣等多名政要的“二二六”事件（1936）等数十起恐怖暗杀事件，以右翼分子广田弘毅上台组阁为标志，彻底终结了战前日本政党政治的进程，实现了自己长期梦寐以求，并为之“不懈奋斗”的“国家改造”目标——建立天皇制法西斯独裁政权。而这一清“君侧之奸”行动与北一辉“暗杀先行于革命”主张如出一辙。^①此外，“革新右翼”势力还通过制造“天皇机关说”事件（1936）等，协助政府破坏了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通过参与制造“三一五”事件（1928）等，协助政府扑灭了社会主义运动。由此导致战前在日本始终未能建立起如同法国和西班牙那样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

(2) 在充当侵略战争的帮凶方面。“革新右翼”势力通过敦促政府推行强硬外交，对国民进行舆论动员，为关东军刺探情报等，协助政府当局发动并不断升级侵略战争。1929年，大川周明以东亚经济调查局理事长身份纠集千余右翼分子，在南起鹿儿岛、北至北海道的日本各地进行巡回演讲，旨在“使日本国民懂得为了日本的生存，必须解决满蒙问题”，并为“必要时不惜以武力解决”，做好“精神准备”。恰如大川周明自诩的那样，这种大规模宣传是“运筹对中国东北侵略的第一个步骤”，“造成了全国性的影响”。^②1931年，大川周明还通过成立专门研究“满洲”动向及对策的“满洲问题研究室”等，实际参与了“九一八”事变的谋划和准备。为此，“满铁”根据他在“九一八”事变准备和发动过程中做出的卓越“贡献”，颁发了“大川功绩调查书”，对其在“满洲事变前后创造出完整而统一的舆论基础所建立的巨大功勋”，以示嘉奖。^③“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内田良平等右翼分子发表《致政府及国民声明书》，要求当局“发挥我炮火之威力”，“严惩”中国。^④1931年底，针对国际联盟理事会通过“限期撤兵”劝告案，日本右翼团体不但在东京召开了数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表示“抗议”，而且由头山满领衔分别向国联主席、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发去“宣言电”，“促使支那反省和国际联盟觉醒”。^⑤一些右翼分子还鱼贯进入中国东北建立“满洲现地”右翼团体。其中，大雄峰会和满洲青年联盟不但协助关东军运输战争物资、慰问和护理伤员、修复铁路和机场等，俨然关东军的后勤补给部队，而且在炮制伪满洲国的过程中发挥了日本国内右翼团体无法替代的作用，被称为伪满洲国的“催生婆”。实际上，在日本日后发动的“一·二八”事变、“七七事变”等一系列侵略活动中，都能清楚地看到这些所谓民间“志士”（即民间右翼分子）活跃的影子。

① 中谷武世『昭和動乱期の回想』上、東京：泰流社、1989、43頁。

② 橋川文三『現代思想大系・31・超國家主義』東京：筑摩書房、1964、360-370頁。

③ 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社会科学院编《“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满铁秘档选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05-408页。

④ 葛生能久『東亜先覚志士記伝』下、東京：黒竜会出版部、1933、87頁。

⑤ 葛生能久『東亜先覚志士記伝』下、東京：黒竜会出版部、1933、91頁。

从犹存社成立尤其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战败投降,日本“革新右翼”谱系通过对内制造一系列恐怖暗杀事件和对外配合政府发动一系列侵略“事变”或“事件”,给包括日本在内的亚太各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历史恶果。

三、战前日本右翼势力研究务须重视的几个问题

史学研究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提供历史镜鉴。鉴于日本右翼势力这一“政治癌瘤”迄今仍在恶化着日本社会的“肌体”和与亚洲邻国的关系,在剖析其战前谱系构成和梳理其祸世轨迹的基础上,总结其活动规律并从中汲取历史教训,显然是本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战前日本右翼势力研究务须关注和重视以下5个问题:

1. 对战前日本右翼势力祸国殃邻的历史危害性要有深刻的认识

从玄洋社成立到日本战败投降,日本右翼势力对内通过制造一系列恐怖暗杀事件,最终建立起天皇制法西斯独裁政权,对外通过配合日本政府发动14年侵华战争(后扩大为太平洋战争),将国家拖上了侵略战争不断升级的不归路。不但给包括美国在内的亚太国家带来了深重的民族灾难,也使日本自身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惨祸和危机,甚至被国际社会视为“蒙文明皮肤,具野兽筋骨之怪兽”^①。同时,战前的“传统右翼”谱系、“革新右翼”谱系与战后的“战后派右翼”谱系、“新右翼”谱系之间,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政治活动手法上均具有一脉相承性。因此,世人尤其曾饱尝日本法西斯蹂躏之苦的亚太国家和民族,有必要认清日本右翼势力这一“政治癌瘤”的极端危害性。换言之,包括日本国民在内的亚太各国人民,对战前日本右翼势力长时段、大规模祸国殃邻所造成的灾难性历史后果,没有理由不永远铭记;对这股国际恶势力再度对日本政治走向、中日关系走势和亚太和平构成潜在威胁的现实危险性,没有理由不保持高度警惕。恰如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12月13日举行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指出的那样“人们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侵略者所犯下的严重罪行”,因为“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一切罔顾侵略战争历史的态度,一切美化侵略战争性质的言论,不论说了多少遍,不论说得多么冠冕堂皇,都是对人类和平与正义的危害,对这些错误言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必须高度警惕、坚决反对”。^②这一言简意赅又高屋建瓴的讲话将对日本右翼势力危害性的认识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既是对战前日本右翼势力“所犯下的严重罪行”的深刻批判,也是对今天日本右翼势力“罔顾侵略战争历史的态度”的有力回应,更是指导新时期中国日本史研究和对外外交工作的思想指南。

2. 对战前日本右翼势力思想理论的毒害性不宜低估

战前“传统右翼”谱系的天皇中心主义和大亚细亚主义、“革新右翼”谱系的法西斯主义和本国自治主义,既是江户幕府后期本多利明(“殖民扩张论”)、佐藤信渊(“宇内混同论”)、吉田松阴(“东西补偿论”)等思想家们“海外雄飞”思想的延续,又是“战后派右翼”谱系和“新右翼”谱系的主体思想——狭隘民族主义、历史修正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思想源;既是近代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小视和蔑视亚洲近邻民族优越意识的恶性膨胀,又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侵略战争披上合法外衣而提出的极具煽动性和迷惑力的政治口号。思想总是走在行动之前。当年若无右翼思想理论的传播,就不会有右翼团体组织的孳生,更不会有右翼政治运动祸国殃邻后果的发生。再从侵略国策和侵略战争均根源于侵略思想这个逻辑意义上看,加大对战前日本右翼势力思想理论即“日本帝国之侵略中国思想”研究的力度,^③当是今后中国日本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① 李玉、骆静山主编《太平洋战争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8页。

② 习近平:《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2月14日。

③ 水野明《日本侵略中国思想的检证》,载钱伯城主编《中华文史论丛》第54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8页。

3. 对战前日本右翼势力逞凶肆虐的社会土壤不应回避

尽管右翼分子刺杀原敬首相、滨口首相、犬养毅首相、井上藏相、安田财阀首脑、团琢磨总裁等政界要人和财界巨头的犯罪事实铁证如山，但在当时，日本社会出现了凶手比受害者更受公众同情这一引人注目、更令人沉思的情形。右翼青年朝日平吾行刺安田善次郎后自杀，事后右翼分子竟在西信寺为这名杀人凶手举行了有千余人参加的盛大葬礼。审判“五一五”事件时，一名被告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后，旁听席上的民众竟报以雷鸣般的掌声。甚至有超过30万份用鲜血签名或完全用鲜血写成的要求宽恕凶手的请愿书，雪片般从全国各地飞到审判官的手里。^①新潟县的9名青年不但寄来请愿书要求替被告服刑，而且竟附上泡在酒精里的9根小手指以示决心。结果，制造“五一五”事件的右翼暴徒们因公众求情和施压而被法官从轻发落，不但没有一人被判处死刑，而且获刑的40余人多年后被全部释放。当时公众、媒体和法官没有把同情给予被害者，反而对杀人凶手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同情说明，日本右翼势力“有潜在的社会基础”^②。值得注意的是，据2006年日本NHK电视台调查，有7成以上的日本人支持首相和参拜靖国神社。东史郎、本多胜一等能够正确反省侵略历史的进步人士，在备受政府冷遇和右翼势力威胁的同时，还要经常忍受来自周围民众类似“叛徒”“卖国贼”“褻渎英灵”的谩骂。而警察对招摇过市的右翼宣传车充耳不闻，部分民众对身边随处可见的恐怖暗杀暴行视而不见，也与战前毫无二致。当年正因为部分不觉悟的日本民众放任乃至同情右翼分子的法西斯暴行，才演出了一幕幕践踏政党政治和杀人越货的人间悲剧。也正因为深受右翼思想毒害的部分日本国民盲从乃至协助了统治阶级发动的侵略战争，才给包括日本在内的亚太国家带来了创深痛剧的民族灾难。目前还有部分日本国民尚未走向觉醒，才导致日本右翼势力重新抬头和小泉等右倾保守政权能够长期执政。如何在推动这部分日本国民汲取战前同情右翼和盲从战争沉痛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更多、更快地走向觉醒，进而铲除日本右翼势力存在的社会土壤和日本右倾保守政权执政的“民意基础”，应是中国日本史尤其日本右翼势力研究的重中之重。

4. 对战前日本右翼分子的所谓“献身精神”不可掉以轻心

战前日本右翼思想家和右翼团体头目，不仅打着“反权门”“反资本”“国家改造”“维新革命”等旗号鼓动青年官兵实行所谓“昭和维新”，而且公然提出要用法西斯“献身精神”武装青年人的头脑。深受毒害的右翼党徒和青年官兵怀揣着“维新革命”理想、“国家改造”信念和“视死如归”精神大搞迫害、暗杀和政变活动。当时流行着一首“昭和维新之歌”，其中云“汨罗之江波涛涌，巫山之雪乱纷飞。混浊之世我独立，义愤然兮血如潮。”“权门在上骄且奢，忧国之诚则毫无。财阀但知夸豪富，全无心思为社稷。”“昭和维新春之空，正义结成大丈夫。胸中足有百万甲，化作樱花万点红。”“休唱离骚之悲曲，慷慨悲歌已非时。吾侪惟仗三尺剑，血染寰宇舞雄姿。”^③正是在这种极具煽动性和迷惑力的口号声中，日本右翼势力尤其“革新右翼”势力，制造出一系列旨在响应和贯彻北一辉、大川周明“国家改造”号召的恐怖事件。

如果说这首“慷慨悲壮”的歌曲还不足以反映战前日本右翼分子的“献身精神”，那么那些身陷囹圄还能“视死如归”的右翼暴徒们在狱中发出的“呐喊”和“绝唱”，当能充分体现这一精神。1932年，“五一五”事件中的一名被告在法庭上慷慨陈词说“我们的行动只不过是唤醒祖国而敲起警钟，生死对于我无关紧要。我要对那些为我的死表示沉痛的人说，不必为我流泪，在改革的祭坛上牺牲自己吧！”^④1960年，刺杀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的右翼分子山口二矢，在收容所房间的墙壁上留下“七生报国，天皇陛下万岁！”字句后，上吊自杀。^⑤他在事先写就的所谓“斩奸状”中

① 猪野健治《日本的右翼》，张明扬、刘璐璐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年，第139页。

② 杨宁一《日本法西斯夺取政权之路》，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6页。

③ 犬丸義一、中村新太郎《物語日本近代史》第3卷，东京：新日本出版社，1972，277页。

④ 约翰·托兰《日本帝国的衰亡》上，郭伟强译，陈亮校，北京：新华出版社，1982年，第13页。

⑤ 堀幸雄《戦後の右翼勢力》东京：勁草書房，1983，40页。

说“本人对你浅沼稻次郎个人并无冤仇，但对你作为社会党党首访华时的谰言和煽动群众乱闯国会的责任，不能答应。在此，我对你实行天诛！”他们所谓“七生报国”“在改革的祭坛上牺牲自己吧”，正是日本右翼分子在祸国殃邻的行径中表现出来的所谓“报国”“牺牲”和“献身”精神。而暴徒们的“慷慨陈词”和决绝行动，不但如前所述获得了民众广泛的同情，而且得到了身为国家机器一部分的、肩负审讯审判职责的警察和法官们的“尊敬”。比如，血盟团事件发生后，“负责调查的警察等相关人士对他们以舍弃自己生命为前提的警世行动的供述，不禁肃然起敬”^①。这是比右翼暴徒的“献身”行动本身更可怕、更令人忧虑的社会大众心理。因此，日本右翼分子的“献身精神”及其收获的同情和“尊敬”，同样是日本右翼势力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

5. 对战前日本右翼势力的恐怖暗杀传统须保持高度警惕

每逢国家“内忧外患”之时，日本右翼分子就会以“忧国之士”或“爱国志士”的身份出现，自以为是、我行我素地采取恐怖暗杀行动，这几乎成为日本右翼势力的一大传统和特征。岛田一良行刺大久保利通、来岛恒喜投弹炸去大隈重信一足、西野文太郎刺杀森有礼等，是“传统右翼”分子在“维护天皇权威”“捍卫国家利益”的名义下实施的。朝日平吾刺杀安田财阀首脑、中冈良一刺杀原敬首相、佐乡屋留雄刺杀滨口首相、小沼正刺杀井上准之助藏相、11名青年军官集体刺杀犬养毅首相等，是“革新右翼”分子打着“维新”“革命”“救世”“清君侧”的旗号进行的。而1960年山口二矢刺杀浅沼稻次郎委员长、1990年行刺长崎市市长本岛等（凶徒逃离现场，姓名不详）、2006年堀米正广焚烧自民党前干事长加藤弘一的老宅、2007年城尾哲弥刺杀长崎市市长伊藤一长等，则是“战后派右翼”分子和“新右翼”分子以“反共反华”“维护天皇形象”“捍卫民族尊严”的名义进行的。可见，战前与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恐怖暗杀行径惊人相似，如出一辙。正如有学者指出：“无论是对内的反体制、镇压人民运动，还是对外反华、宣扬军国主义，右翼倾向暴力恐怖主义的‘历史偏好’并未因时代和自身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它依然作为日本右翼的典型集团性格和最具代表性的特征被继承了下来。”^②因此，有人指出，日本“军靴声日益临近”，“时常能够听到军国主义的脚步声”，日本有“重蹈历史覆辙的危险”^③，“日本现在的情形”与1931年至1936年期间的情形“惊人相似”等^④并非耸人听闻。笔者认为，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恐怖暗杀暴行所具有的心理威慑功能及扭转国家航向的政治效能，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并保持高度的警惕。

综上所述，战前日本右翼势力经历了从“传统右翼”谱系向“革新右翼”谱系的嬗变。两大谱系既有区别，又一脉相承。既在战前写下了祸国殃邻罪恶的一页，也出人意料地为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重新抬头树立了样板。因此，对战前日本右翼势力思想理论的毒害性、组织活动的规律性、逞凶肆虐的破坏性、暗杀传统的危险性等，包括美国在内的亚太各国不能不保持高度警惕。

责任编辑：刘莉

① 猪野健治《日本的右翼》，张明扬、刘璐璐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年，第40页。

② 吴限《日本明治时期的右翼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58页。

③ 紫水、效时《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北京：金城出版社，1997年，第8页。

④ 《日报社论：警惕日本恢复“战前”状态》，《参考消息》2007年4月23日。